



神话的窥破

——当代中国女性写作研究

陈惠芬 ●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陈惠芬●著

神话的窥破

——当代中国女性写作研究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责任编辑 南 浦

封面设计 阿 敏

神话的窥破

——当代中国女性写作研究

陈惠芬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5 插页 2 字数 218000

1996 年 11 月第 1 版 199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ISBN 7-80618-271-3/I·151

定价:12.00 元

绪论 当代女性解放的精神重构

欣悦的瞬间

或许就在民族前途已经灿烂若锦、女性解放亦已成为历史陈迹的未来时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我国社会所经历、所发生的变迁，却至为鲜明地镌刻在、烙印在民族、尤其是女性的集体无意识中：恰是在这一历史的瞬间，当代女性在被长期的压抑和抹杀后再度作为一个群体而出现，并以其特殊的敏感和执着，深切地感受了民族振兴中的焦躁和悸动、痛苦和欢乐，以及女性自身解放中的奋进和迷茫、欣喜与困顿。中国女性在这一历史时刻的遭遇，构成了当代中国最为重要和动人的景观之一。

诚然，女性的再度出现并不意味着重造一个新的性别，其首先表现的不过是对失落的“自然女性”的恢复；然而，即便如此，也已经表明了一种时代的巨大的发展。曾几何时，在“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的口号下，女性不仅在行为规范上、社会功能上，而且在衣着、体力上也被要求和男性一样。因而，漫漫十年的历史浩劫，对于命运坎坷的当代女性而言，恰似双重的磨难，不仅意味了自我意识、主体人格的失落，而且意味了与身俱来的自然性别也遭到了废黜。在那段荒唐的岁月里，“我是谁？”“女性是什么？”恰似一个没有任何依凭和必要的设问；女性作为一个独立的、有独特个性和性别特征的群体已经不复存在。

所幸的是，这种状况由于一场有关民族命运的社会大变革的

来临而获得了、或正在从根本上得到改变。七十年代末蓬勃兴起的思想解放运动中，极左思想遭到了摒弃，伴随着社会对长久以来所忽视的自我意识和个性的重新认可，女性的特点和独特个性也受到了关注。女性开始从服饰、发式、言语笑谈和举手投足中“浮现”出来，从一片混沌的“都一样”中区分出来；在紧接而来的社会和经济的改革中，女性的特性则被进一步意识和发掘。时至今日，几乎谁都不难承认，女性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她们的生活 and 世界正在成为我们社会中最令人瞩目的一部分，当代女性在短短的然而翻天覆地的十几年的变革中的命运变化，其变化的程度和鲜明性可说是超过任何一个社会群体（或只有当代中国农民的命运变迁可堪比拟）。当然，十几年的时间未必即刻铺就了当代女性解放的通天大道，也必定未及将几千年关于女性的旧意识扫除一清，然而，经历了思想解放运动和经济改革两番社会结构变动的当代女性，则肯定已不是一个被抹杀、被压抑的性别群体，女性的问题正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和“另眼相看”：以往被忽略不计的女性特有的问题，比如女性的生理—心理问题，包括性心理、性行为，女性一生的周期等等，正在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女性独特的情感、婚恋问题、个人生活隐私等等以往不被保护、缺乏安全感的方面，也逐渐得到了尊重和理解，可以说，现时女性的生活和情感比当代社会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少压抑而多自由。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当代女性的生活和命运从此便没有问题。或许应当注意的是，当代女性的命运变迁并不是凭空而起或发生于一凝固无变的时空中，相反，却正是处于一个剧烈的变动之中。在当代女性生活变迁的背后，是转型期社会斑驳、复杂、杂乱、无序的时代背影和各种力的重组和冲撞，是新旧意识和结构更为尖锐深刻的冲突，这便决定了当代女性命运的多面性和未可简单乐观。如果说，我们正置身其间的、自七十年代末以来频频变迁的社会、时代，对于敏感的当代女性来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自由欣悦和值

得珍视的时刻，那么，她们的意识生长也至多地表现为一个个“瞬间”的呈现——在一个急速变化的、充满了“断裂”与“再生”的转型社会中，当代女性的意识生长与其说是一个有着明确的连贯线索的过程，则不如说是一个个意识的片断；而唯是凭借着它，当代女性才在一个“方生方死”而不无痛楚和限定的历史变动中，叠现了、再构了自我解放的欣悦瞬间。

时代际遇与“命运”悖论

无可置疑，历史的变动带来了女性作为一个有着独特的性别特点的群体而重现于现实社会的可能和机遇，然而，时代的发展则也使女性遭遇了再度的失落——失落于一个过分女性化的、抑或传统女性境地之中的危险和诱惑；而这样一种危险和“诱惑”，几乎是在女性重现的那一刻便同时存在或出现的。

如同正是“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成了当代中国七十年代末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驱”或“排头兵”，女性作为一个有性别特点的形象而显明地展现于社会的视线中，最早也是通过文坛而呈现的。其时，女英雄张志新成了性别“正名”的最好载体和指证：“只因一只彩蝶翩然飞落在泥里/诗人眼中的世界才不再是黑灰色的”^①，这个十年浩劫中真正的大勇者，不仅以其“唯一”的抗议者的姿态，以其威淫不能屈的高风亮节和坚贞，在彼时的社会意识中赢得了人们的广泛的敬意，而且以其美好、以其具有“女性美”的举手投足和风采，为人们矗立了一个内在和外表完美统一的“理想”的典范，一如既往年代另一个女英雄江姐在临刑前的整妆，更添了英雄的魅力和感人的力量。通过对英雄的指认，女性的性别特点在长久的失落和被抹杀后，“名正言顺”地重新回到了社会和女性的生活之中。然而，其时伴随着“失落”的时代和女性“回来”的，不仅是女性自然的性别特点和风采，也是各式各样的女性规范和女性

角色。同样是在充任“思想解放”的“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中，女性至多地出现在本文的叙境中，构成了本文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这些在过往的历史中必然置身于“都一样”的社会境遇中的女性，在此时的本文中都有了明确的女性身份，如果说十年浩劫中，女性的面目正同那被劫掠的历史一样模糊不清，那么，此刻，在特定的语境和叙事需要中，尤其是男性作家的笔下，她们不再是以往“男女都一样”的社会规范下以“准男性”的面貌出现的女性，而是一个个有着确切所指的女性角色和规范的代表，她们一方面是历史灾难的受害者或时代错误的蒙羞者，一方面也是“女性”的恪守者或者背弃者，往往，女性的贞节/对爱情的忠贞和对革命、正义的忠诚、信仰联系在一起，历史的曲折和不幸则和“女性的失落”有关，她们因此而在本文中享受着或为同情赞美或遭指责鄙弃的不同待遇。不难看到，这一凭借了或产生于“历史控诉和反思”的关于女性的话语，事实上是建立在对于传统的女性规范的重新确认的基础之上的。如果说既往极左思潮下的社会历史正是通过规范女性而规范男性，抑或通过“强化”女性而“弱化”男性（仍然是以“男女都一样”的方式），那么，在一个“拨乱反正”的历史时刻，当代中国的社会男性似乎正是要通过对传统女性的呼唤、确认而重振男性的雄风和实现秩序的重建。出现于“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的交界处的《天云山传奇》^②，某种程度而言，正是最早泄露出社会的这一无意识的，其间两个不同性格的女性正恰代表了传统的男性文化对于女性鲜明的褒贬倾向，连同它的一男二女的爱情模式，都无不在一个隐秘和象征的层次上满足着男性中心的社会心理。不同于《天云山传奇》委婉的“询问”和“拒斥”而表达出更为果敢、明确的意向的，是挟带了“改革”旋风的《乔厂长上任记》和《赤橙黄绿青蓝紫》^③等。《乔》中成为改革家、铁腕人物乔光朴的映衬的是女工程师童贞，恰如她的名字一样，虽然她在专业技术上不无独挡一面的能力，在感情生活上却如孩童一样“纯真”、小鸟依人，是可望为男

性驾驭和指导的称职的助手。《赤橙黄绿青蓝紫》则代表了男性征服或“挽救”失落了“本性”的女性的意志和雄心，同时也是对“失落”的男性雄风的自我挽救。按照某种男性批评家的读解，作品中解净“在男女都一样”的时代中，由于握有对男性的“统治”的权力而感到了一种自信，但她的心灵承受力依然在女性世界的低点。这种本质冲突应当对她的生活世界发生重大的影响，使她对自身孤独的人生感到威胁。然而由于某种虚妄的信念，其对自身的失落浑然不觉，这时，“刘思佳的到来，一个真正懂得生活，蔑视常规的男性，在她的心灵中展示了一幅另外的图画。它的线条和色块里男女分明”，“男人和女人都必须依照本性改造生活同时改造自己”，“她由此而从政治的女性回归到人性的女性，多少知道了在这个倾斜的世界里，女人应取的态度”^④。按照常规，批评通常比“以形象说话”的本文更为意向鲜明的方面是“直抒己见”地揭示作品的“本质”，如上出自男性批评家的解读显然更能体现作品的创作意图；除此功能之外，如上批评另有价值的方面是无意中解说了“征服”或“挽救”的社会语境，其时社会对于传统女性规范的指认正是掩藏在、或凭藉着“人道”、“人性”、所谓的“人性的女性”等等的时代话语而进行的，它将男权的复归掩饰得不那么引人注目，同时并拥有了打破以往规范的解构力。

然而，如果说，在新时期的初年，对于按照“本性”的女性的呼唤尚具有“拨乱反正”的历史意义，那么，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和商品经济的兴起，在社会大众传播媒介中频频出现的女性形象以及日常生活中关于女性的诸多界说，则有了更多的男权指认的意味。曾几何时，我国偌大一片国土，一片曾经不知商品生产为何物的国土，顷刻间为商品的大潮所渗透、所覆盖，一方面，即便是商品生产发达的十分都市化的社会环境里，也依然存在着深厚的封建主义的因素，另一方面，即便是偏远的乡土农村，商品生产的踪迹也已经罕然而至，这构成了我们社会发展中的“奇观”，它生动地传达出

一个低起点的社会，急迫地愿望消除匮乏、缓解焦虑的希望与渴求，表现出民族在历史关键时刻的别无选择的选择。然而这一切并未能及时缓解这一固有的焦虑，却反而加剧了这一焦虑：由于几百年的历史要求压缩在一个历史的瞬间，过程本身的矛盾在激烈的挤压下难免表现得分外的尖锐和复杂，加之骤然变化带来的断裂和脱节，低起点和高目标的冲突……凡此等等，转型期社会的这种无序状态和商品经济的无所不往，给女性的生活和意识造成了新的困惑。我们看到，当代女性在一个不为注意的顷刻已经“分裂”成了两个部分：当一部分女性在八十年代末的社会结构重组中处于劣势、被判“出局”之时，一部分的“女性”却奇迹般地崛起。几乎就在女性不再是必不可少的“半边天”，时代也不再以男女为“一样”的同时，女性成了社会瞩目的中心：从爱妻牌洗衣机到永芳护肤液，从时装新潮流到“办公室革命”……凡此种种，只要你打开电视机，按下按钮，一个个美奂美伦的女性形象就会出现在你的面前，成为你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场景之一；与此同时，对于女性的新的解说也蜂涌而来，从大众传播中形形色色的女性形象到 office 得体大方的白领丽人，以及种种关于“女人味”、“女人的奥秘”的关注和界说，不难发现，进入商品经济未几的社会历史在转瞬间已经重新设定了与之相应的新的审美标准，发掘了一套新的女性社会化角色。这一切，对于女性以往被抹杀的生活历史和性别不啻是一次解放，女性以及社会几十年无性的历史，由于一个十分注重“性别分工”的时代的到来而彻底结束，但对于女性的现实生存和意识解放来说，却未必是一个理想的境界。诚然，女性在社会和角色的变化中也获得了机会，获得了“自由”伸展、表现、甚或实现自己的机会和“权利”，而通常被有意无意地掩盖和忽视的一点，则是女性的“自我伸展”和实现其实并不那么自足，至少不象表面呈现的那样自主，在她们那潇洒自如的“个性”后面，另有角色强制性的一面，那便是商业主义的文化密码和男性社会的文化规则对女性有形无

形的引导和塑造。如果说,在“拨乱反正”的历史时刻,有着自然性别的、不同于以往规范的女性形象的出现,首先意味着社会对极左思想的冲破,那么,在滚滚而来的商品经济的大潮下和不断变化的社会生活中,女性新的社会化角色以及大众传播中的女性形象等等,则已在不知不觉中被纳入了商业主义的运作机制和重返到传统的男性文化的范畴,女性因此而再度面临了“自我”失落的危险——失落在一个商品化和过分“女性”的境地里。

显而易见,如果说商品经济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意识形态的制约和操作,那么,它却是男权主义复活和抬头的有利时机。凭借着时代的“天赐良机”,当男性在商海中显出了身手,一度萎缩的男权主义也随之展露了头角,而男性文化固有的“欲望化”原则和商品经济的交换原则的结合,则在一个新的层面上造成了对女性的新的损伤,此时此境下,无论是在社会生活的日常形态中,还是在意识的表达如世俗的神话、文学作品中,关于女性的侵犯性和歧视性的行为和话语都以一种较以往更为明显的形式表现出来,当代女性的生活由此而面临了一种“命运”的悖论:如果说时代变动的际遇提供了“机不可失”的女性重现的机会和可能,那么,也恰是时代的进一步发展使女性再一次面临了失落的危险。而当代女性的命运似乎自“有史”以来一直就处在这样的悖论中,不难回想,一个长久以来遭压迫、受歧视的“第二性别”在一场翻天覆地的历史变革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而正是当她们有了和男性一样的生活天地的时候,却失去了确认和表述自己性别的权利和话语的可能。诚然,“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堪称是自开天辟地以来,对于几千年既成历史的一次最为重要、深刻的的改写和扭转,但它在对既往的性别歧视进行颠覆的同时,也否认了女性作为一个有着独特的性别特点的群体存在的必要。在其时的历史条件下,“男女都一样”事实上不仅意味着男女的社会权利地位等等方面的平等,也意味了男性与女性、两性间必要差异的取消和抹杀。

但并非是传统的男性和男性规范成了女性直接效仿的模式，而是社会和秩序所要求于男性的，包括在思想、行为、话语和体力、外表、服饰等诸方面，同时成了对于女性的要求，于是女性便不复为女性，而男性却也并非因此而稳固了社会主体的地位。换言之，在特定的社会系统中，“男女都一样”在“强化”或“取消”女性的时候则“弱化”了男性，这使得当代男性的素质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磨损和“失落”，以至在一个新的历史时刻到来的时候，会令人啼笑皆非地出演了那么多的“寻找男子汉”的悲喜剧；而女性在漫长的以社会男性的规范作为唯一的行为和性别规范之后，也对“都一样”的要求和待遇感到了由衷的厌倦和自我的困惑与茫然。长期以来，作为当代女性生活的另一个悖谬之处在于，一方面，女性被许诺、被要求为和男性“都一样”，而另一方面，确保女性在社会意识和家庭诸方面真正解放、真正平等的文化—意识革命却始终没有真正进行，为此，女性常常一方面作为和男人一样的“人”承当着社会的责任，履行着“义不容辞”的“半边天”的职责，一方面，她们又是女性传统角色的“不容推诿”的承担者，女性由此而在获致社会解放的同时，身不由己地处在双重角色的重压之下，这给她们的身心活动带来了极大的分裂和倦怠，她们因此而迫切地希望寻找一条真正解放抑或“解脱”、哪怕只是片刻、暂时的道路——这或许就是为什么，借助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而重新抬头、“复归”的男权主义对于女性角色的重新命名与指认，相当程度上恰是得到女性本身的认可和配合的原因吧^⑧。

然而，作为一个有着“五四女性”的动人传统、在时代的变迁中恢复了自我性别的正在觉醒、成长中的意识群体，当代女性不可能真正缄默，真正默契于男性中心和商业主义的文化要求，她们必然地要在时代的发展中再度审视自己的现实和历史的处境，审视她们“不可抗拒”的命运的由来；虽然这一次，比之五四女性的自我审视和觉醒，可能要来得更为曲折和复杂，在她们作为一个解放的群

体经历了一再的时代际遇和“命运”的悖论之后。

写作作为一种拯救和重构

几乎谁都注意到了,我国的社会历史上没有发生过纯粹意义的或者说独立的妇女解放运动。中国妇女在社会地位、经济权利等方面获得的空前、最大的解放是新政权凭借着秩序的力量由上而下地赐予的,中国女性在一场“开天辟地”的革命中,意外地获得了和男性一样的政治和经济的地位与权利,由此而得以摆脱了几千年来“第二性”的地位而和男性一样站立在了同一的地平线中;五四妇女解放运动诚然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永载史册的女性的自我觉醒,中国女性那沉默、无言、蜷缩于历史地心的生存凭借着一场民族的变迁而浮上了历史的地面,但五四妇女运动作为中国女性寻求解放之路的真正起点,是和其时的学生运动、工人运动融和在一起的,它与其说是一场独立的妇女运动,则不如说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所裹挟而出的一部分——而唯其如此,女作家、女性写作便势所必然地成为中国女性解放的精神代表,成为社会性的独立的妇女运动的象征或替代,成了女性自我的“拯救”和意识重构的有效途径,这某种程度成为中国女性解放的特点之一。众所周知,五四时期,正是女作家群的出现宣告了中国女性觉醒的开始,在那个至今想来仍让人缅怀不已的历史时刻,现代女作家作为一个性别群体的文化代言人而登上了历史的舞台,成就了“中国女性最初的自我叙事和选择”;七十年代末以来,在一切“女性的重现”中,女作家和女性写作始终是一道最为引人注目的景观,她们的追求和探索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代女性意识成长的高度和社会所允许到达的高度,当代女作家群的写作追求由此被看作是继五四女性写作以来的又一个高峰。

在我国历史变动的重要的关头和时刻,正是女作家、女性的写

作而不是如西方那样的社会性的“女权”运动成了女性解放的意识代表,这不仅是在于,对于一个由于种种原因而未能引发出独立的自我解放运动的性别群体来说,一如女性主义的批评所以为的那样,女作家往往在自己的作品里建立女性自我的世界,同时又通过成为小说家这一行为本身,通过拿起笔杆(吉而伯特和格芭所谓的“阴茎的比喻”^⑧)而改造和抵制这个世界,她们认为,“妇女作家别无选择,她们不得不在占统治地位的‘象征性’秩序内工作”,“然而她同样必须用一种新的象征去瓦解原有的象征性秩序”^⑨,这时,“虚构”的小说创作便成了合适的形式和途径;而且在于,作为真正的妇女解放运动,除了政治、经济等等的社会变革和保证之外,必须伴之以一场意识和文化的革命,现当代的女性恰是在一个历史的瞬间浮现到了现实的层面,然而她们的命运和地位并非一个瞬间的产物,只有辅之以深刻的文化革命,才能破除历史长久以来沉积在、压抑在她们身上的意识重压和负荷。女作家作为女性群体中的意识工作者,正无形中承担着文化“拆解”与重建的功能、使命,她们由于“身为女性”的处境和切身的感受,加之敏感的意识,往往可能比一般的社会文化批判更为犀利地触及到女性生存的本质。不难肯定,女性解放中的最为鲜明、生动和重要的意识发展恰是通过女性写作而表现的,五四时期和当代社会的状况无不如此,这应当便是女作家、女性写作在相当程度上成为女性解放的社会替代的原因。

然而,作为一个未有性别群体独立的自我解放运动支持的女作家、女性写作,其意识的生长、文化的批判和自我的抒发事实上是有着“结构的缺损”和特殊的困难的,尤其是在一个转型的社会里,她们的意识难免遭遇到和男性主流意识文化的冲突和矛盾,并同时承受着转型期社会女性特有的焦虑和内心分裂。如果说,在五四以来的现代女作家中,其意识的障碍主要来源于创作的视域大多笼罩在、重叠在男性大师、主流文化的巨大的阴影之下,为了从

“小我”走向“大我”，她们渐渐地走向了“无我”，那么，对于曾遭抹杀的、只是凭藉了一场新的社会变迁而重新出现的当代女性来说，她的至为深刻和令人分裂的矛盾则是：做人，还是做女人？“难道我注定了要在专注的、不变的爱本能和不断保持自己的奋斗中，苦苦地来回挣扎？”映现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最为敏锐的女作家之一的张辛欣的诸多作品里的困惑和苦恼的“天问”（包括“我在哪儿错过了你？”、“在同一地平线上”？哪里是“最后的停泊地”？^⑧等等，其实也是其时、乃至整个新时期和今天大多数女性深深的内心困域和欲理还乱、欲说还休的问题，这构成了当代女性写作的一个经久不息、绵延未止的或显或隐的主题。由于社会历史的原因，中国女性“做女人”的权利很长时间内遭到了剥夺，当然因此所谓“做人”也就未免是一种空洞和未有所指的匮乏；而时代的变化、社会的转型，却使她们在找回“女性”的时候又面临了“人”的失落，“做人，还是做女人”因此成了当代女性意识重构和现实选择的起点，同时也是时代赋予女性的特殊的问题和处境。如果说，在寻求“人的尊严”的新时期初年，“人”的归来的同时也是“男性自我”的归来，做人和做男人是统一的，那么，对于女性来说，却并非是一自然统一的过程。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裂隙并未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而自行弥合，相反，愈到后来，在商品经济兴起之后表现得愈加深刻和复杂，因此，相比于男性，当代女性、尤其是表现在女作家的创作中，她们的心理和意识是分裂的，她们未能像男性作家那样拥有一个基本统一的自我而行写作，她们也因此而未能建立起一个完整、明晰的意识发展的传统，而那种分裂、跳跃、左顾右盼而不乏意识发现的瞬间和状态则构成了当代女性精神重构的不绝如缕的来源和至为生动的写照。

当代女作家的意识“分裂”也表现在她们的“话语”表达上。说起来，女性的觉醒主要是一个“意识”观照和发现的问题，但同时也、或首先是一个关于“表达”的话题，按照现代语言学的说法，从

深层意义上说,不是“我们说”语言,而是“语言说”我们,而女性没有自己的语言,当女性还没有说出“自己”的语言的时候,“语言”已经限定了她。如果说既往的历史、父权制漫长的压抑抹杀了女性作为一个群体的自我意识,那么它也同时取消了一种作为意识载体的女性话语的存在,或许,在既成的文化规范里,从来没有出现过一种独立的女性话语,就像没有存在过纯然的“女性的意识”,女性、当代女作家因此而陷入了另一种“分裂”:一方面,既成的充满了男性文化谱系的话语系统在女性未及开口之前已经“污染”了她;而另一方面,她无法在既成的语言规范下创造出另一套纯属自己的话语系统,而不得不用“污染”了语言来描述自己,这就使女性陷入了两难的困境,如果她坚持创造和使用一种独特的、纯“女性”的话语——且不说是否可能,那么就将冒与他人、社会不可沟通的危险,从而失去了对既成的象征秩序的解构力,而如果继续使用“污染”了的语言,则必将不能真正可靠地表达自己,所谓“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⑩。因而,对于当代女作家来说,写作与其说是一种“创造”,不如说是一种改写;与其说是一种“自我表现”,则不如说是一种“花木兰”式的化装,^⑪一次带着镣铐的跳舞,而无论如何,写作—文学的创作对于当代女性来说依然是自我意识、精神重构的最好途径,一如克里斯蒂娃在《人怎样对文学说话》中所说:“在那些遭受语言异化和历史困厄的文明中的主体看来……文学正是这样一个场所,在这里,这种异化和困厄时时都被人们以特殊方式加以反抗。”当代女性写作的艰难和可贵或许也在于,恰是在象征秩序的压抑和限定之下,她们顽强地发掘了女性叙事的缝隙和可能,这并非是一种重造,而是改塑,“即没有能够摆脱父权制象征系统的捷径,但妇女在有意识的重读和复述父权制的核心本文时,可以变被动为主动,她可以游戏本文,在这种游戏的模仿中,她可以保持区别男性范畴的某种独立性”^⑫——如果说这正是当代一部分女作家的叙事策略,那么更多的时候女作家往往

通过重建经验的对象,即通过重构语词、音调、意象而改变既成的经验。随着女性写作的深入,在时代的“允诺”下,一些更为年轻的女作家则开始尝试寻找一种建立在“自我躯体”之上的语言,她们的写作有意无意地吻合着埃莱娜·西苏的把女性的躯体视作女性写作的重要来源的浪漫化视点,^⑩当她们重申着女性“……不仅以皮肤写作,同时也以头脑写作”^⑪的时候,事实上已经透露出她们对于自我躯体的意识。尽管如此,身为女作家必然同时遭遇到“失语”的困窘和尴尬,这便促使了她们在不少的场合,又依然加入到一种“一体化”的主题、结构、故事的“寓言化”写作中,这或许就是我们在当代女作家的创作中,在感受到一种自我建构的努力的同时,又感受到其不无明显的自我离心的缘由之一,但对于当代女作家来说,或许这却是“命定”。

当代女性写作中另一令人注目而不无意味的倾向是:几乎所有有当代重要的女作家都不约而同地宣称过:我不是女权(性)主义(者)作家。如果说在八十年代急切的对于“现代化”的询唤中,其时不少西方的哲学思潮和社会理论都是人们乐于指认或借鉴的对象,那么,女性主义则始终是一个令人尴尬、躲之不及的“幽灵”,包括那些最大程度上代表了当代女性意识觉醒的女作家亦如此,或者说在她们的身上表现得尤为分明和反差强烈:一方面正是这些感受敏锐的女作家表达了、代表了当代女性觉醒的鲜明意识,一方面她们却表现出令人“不解”的与“女性”的距离感,其中的突出者,甚至不愿以女作家或女性写作来命名她们的创作——或许,伊丽莎白·詹威当年对美国妇女文学的论述可以用来解释这一现象:“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某些职业文人把女作家的作品排除在主流文学之外,而又以主流文学的标准来衡量她们的作品。因此,这些人所说的妇女文学往往带有贬义。当今的女作家拒不承认这一说法,正是出于对她们作品蔑视的一种抗议”^⑫,当代女作家大都宣称一种“超性别”的写作立场,虽然她们同时不可避免地表现出

独特的女性意识并为“做女人”的内外要求所驱使而自觉不自觉地发掘着“女性”的一面；直至九十年代的到来，女性写作、女性立场才以一种更为鲜明、“先锋”的姿态而出现在文坛上。然而即便在这里，超越性别立场也依然是一种不能抛弃的态度^⑨，不同的是，如果说，前此的“超性别”更多地表达了“策略”的意义，那么，此时，则可能更多了自觉的意识——对一种将女性写作由此即限定在“女性”内的警惕，这一切都无不真实、生动地表现了当代女性、即便是其精神代表如女作家们的意识和处境。确实，对于正困扰在“做人，还是作女人”的两难以及种族生存的困顿中的中国女性、女作家而言，是难以和西方女性主义取完全同一的姿态和立场的。她们难以有那种明确的与男性中心对垒的态度，也不能满足于仅存在于“女性”一隅，这或许是敏感的当代女性写作的策略之一种，以免因为对“女性”的坚持而被排斥在社会领域之外（一如佳·查·斯皮瓦克以“策略的本质主义”来抵抗“历史女性”的失落^⑩），显然，几乎谁都不愿意（或许也不必要）因此而成为男性文化鲜明的对立面；与此同时，种族生存的严峻性也一定程度消解着当代女性与“超越”一切阶级、国度、种族的所谓的女性的共同性——某种西方女性主义的认同。然而，对于社会两性关系原则和种族生存的敏感并没有抹去当代女性、女作家独特的生活感受和历史遭遇，恰是凭借着这一既坚持、又“妥协”、既认同又隔离的“分裂”的态度和自我处境，中国当代女作家在无意中成就了一种不同于西方女性主义的第三世界的女性写作或叙事，一种自我解放的精神重构：关于女性与自我、女性与男性以及女性与社会、种族关系的探讨。

意识重构和神话的窥破

似乎谁都没有想到，女作家关于自我、关于群体解放的意识重构竟是从“无”的发现开始的——并非是克里斯蒂娃意义上的“否